

中国运城古城的晋商与城市空间结构关系研究

吴浩铭

四川大学商学院, 成都 610065, 四川, 中国

摘要: 在国际社会日益重视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 历史城市的个案研究可为具有多样文化与自然背景的城市之保护与利用提供有益借鉴。本文以山西省运城古城为研究对象, 结合历史文献梳理与实地调查数据, 考察其在不同时期的空间结构。研究内容包括: 城市的选址因素, 晋商兴起前后建筑、道路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 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成因。研究发现, 运城的营建主要出于盐业生产管理的需要, 其空间结构亦围绕这一目的而演化。尽管政府政策为晋商进入运城提供了条件, 但晋商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十分有限; 相反, 公共设施的兴建显著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福祉。上述发现表明: 在运城, 晋商只是与政府政策相契合的一种阶段性社会经济现象, 而城市本身则从根本上由政府主导的盐业生产与盐务管理所塑造。

关键词: 历史城市; 空间结构; 晋商; 盐业; 城市规划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nxi Merchants and Spatial Structure in Yuncheng Ancient City, China

HaoMing Wu

Business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Sichua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rowing international emphasi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ase studies of historic citie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ities with diverse cultural and natural contex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Yuncheng Ancient City in Shanxi Province, utilizing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to examine its spatial structure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The analysis includ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city's locational factors, changes in its buildings, road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before and after the emergence of the Shanxi merchants,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se chang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Yuncheng was constructed primarily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salt production, with its spatial structure evolving to support this purpose. Although government policies facilitated the entry of the Shanxi merchants into Yuncheng, their influence on the city's development was minimal. Instead,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facilitie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welfare of local residents. These findings clarified that in Yuncheng, the Shanxi merchants represented a temporary socio-economic phenomenon aligned with governmental policies, while the city itself was fundamentally shaped by government-led salt produ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Keywords: Historical city; Spatial structure; Shanxi merchants; Salt; Planning

一、引言

近年来,国际社会日益强调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突出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UNESCO 世界遗产公约)。许多国家已通过立法保护并传承具有多样文化与自然背景的历史城市,认可其在维护文化多样性方面的作用(UNESCO)。

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主要法律框架是《文物保护法》,该法于 1982 年首次颁布,最近一次修订为 2017 年。依据该法确立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截至 2023 年已有 142 座城市获此称号(国家文物局)。

今日中国的历史城市大多可溯源于古代的城墙聚落 [1]。然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为容纳增长人口而进行的城市扩张,促使老城区不断更新。这一过程导致包括城墙与历史建筑在内的原有要素被拆除,历史道路被改造或拓宽。城市的空间结构随之改变,其独特性往往被削弱,并对当地居民的认同感产生负面影响 [2]。

与此同时,保护并传承历史城市的独特风貌,能够为城市规划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路径。此类努力有望超越单体要素的保护,在城市环境内部形成协同效应,并推动区域间在遗产保护上的协作(UNESCO 世界遗产公约)。

在历史城市中,空间结构是由城市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维度所塑造的物质现象,并在独特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演化 [3]。这些结构界定了城市的特征,凸显出保护那些赋予每座历史城市以身份认同的独特要素的重要性。为实现有效保护,首先需要通过识别构成空间结构的历史要素来厘清这些特征 [4]。进一步理解空间随时间演变的内在规律,则有助于制定兼顾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策略 [5]。

山西省位于中国中部,是汉文化与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黄土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该省的城市历史上发展出军事防御、金融流通、采矿与商贸等多元功能 [6]。山西的城市化进程一般被视为经历了三个阶段:秦汉时期的行政奠基期、唐宋时期的人口扩张期,以及明清时期的建筑定型期 [7]。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晋商的兴盛加快了城市发展,所形成的空间结构至今仍界定着这些城市的面貌 [8]。城墙、中心行政建筑、轴线、重要建筑与历史街道等关键历史要素,均在这一时期确立,并对整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运城地处山西南部,境内的盐湖历来是中国历代政府所重视的战略资源。运城历史上被称为“河东”(黄河以东),其行政边界与行政中心随时代发生过显著变动。从最初的聚落、古城墙的营建,到周边城区的整合,今日的运城市域面积已扩展至最初城墙范围的约 7900 倍。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有城墙围合的运城古城,以下简称“运城”。在其行政与空间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常被忽视。有学者指出,城墙的拆除以及由此造成的传统空间格局的丧失,稀释了运城的文化意义,并中断了其历史连续性。为确保运城独特风貌与历史叙事的延续,首先必须对这些特征作细致的识别与理解。

在开中法之下,运城被有目的地营建为管理盐业生产与贸易的行政城市。作为食盐生产以及以盐易物的关键场所,运城的空间发展深受其行政职能影响。随着晋商的兴起,商业繁荣开始在城市营建上留下印记。然而,尽管自然与社会因素为探讨历史城市特征提供了条件,晋商对运城空间结构的具体影响仍不清晰。

既有关于运城古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历史记载、盐业的发展、生产与制作工艺。同样,虽然关于盐商的研究成果颇丰,但这些成果多聚焦于商路、经营方式与利润统计,往往侧重更宏观的商业史,而非运城具体的城市发展。针对运城古城空间结构的研究虽已取得进展,但对于晋商的出现与兴盛如何影响运城空间格局的变化、如何促成该城的特征风貌,仍缺乏分析。要完整理解塑造运城的历史动力,对这一互动关系的深入考察十分必要。

本文以运城古城为对象——该城在开中法下发展为晋商从事食盐交易的贸易枢纽。通过将其物质特征与文

化背景相互印证，本研究旨在阐明以下问题：

- 1) 空间结构的变化：运城古城的空间结构——包括建筑、道路及其相互关系——在晋商出现前后如何演变。
- 2) 变化的动因：这些空间结构转变背后的原因。
- 3) 晋商的影响：晋商的发展如何影响运城的空间格局。

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探讨保护与利用运城古城独特风貌的有效策略，最终目标是为一历史城市遗址的可持续保护与实际利用提出建议。

二、研究方法

运城古城位于中国南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其周边自然环境南倚中条山，北临中条岭，西北有稷王山；北面有涑水河，与人工开凿的姚暹渠并行。古城以南为一片湖泊，蕴藏丰富的盐类资源，包括东池（湖体主要部分，即盐湖）、硝池以及合称西池的六个小池。本文的研究范围限于由城墙围合、面积 1.8 平方公里的历史运城古城。

为厘清运城古城的特征，本研究采取以下路径：

（一）建城动因与空间变迁的考察

在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语境中揭示建城动因、空间结构的变迁及其驱动因素。以古籍文献、历史舆图等材料开展文献研究，收集不同时代运城古城的信息，包括城市与盐湖、盐务管理、周边城区、晋商以及关公信仰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按时间轴展开分析，厘清空间结构的变化，尤其关注晋商出现前后城市的转变。

（二）传统历史要素的分析

分析中国古代城市所特有的传统历史要素——如边界、中心建筑、轴线、重要建筑与历史道路——在运城古城中的形成、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结合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收集上述历史要素的数据，并使用 ArcGIS（10.5 版）按时期绘制专题地图，对空间与历史数据加以可视化呈现。

通过上述方法的结合，本研究力求揭示运城古城的独特特征，并对其在自然、文化与经济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发展形成全面认识。

三、研究结果

（一）盐湖概况

运城盐湖，又称河东盐湖，由自然地质作用形成。反复的构造运动使盐层与水体交汇，形成盐湖；其后的沉降造就了四周环山封闭的盆地，为盐类析出创造了条件。此外，盐湖所处地带多风，为大规模晒盐提供了有利条件。

有关盐湖的最早记载可追溯至古籍《山海经》。今日的盐湖东西长 25—30 公里，南北宽 3—5 公里，总面积 130 平方公里。

作为古代中国北方重要的食盐供给地，盐湖使运城地区成为历代中央政府竞相经营的战略要地，这也促成了该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核心区域之一的地位。

《水经注》记载，自东汉以来盐湖的规模基本未发生变化。这一稳定性不仅得益于该地区稳定的地理环境，也得益于历代政府与地方社区对湖体的持续维护。

（二）运城古城空间结构的变迁

基于现有资料与不同社会背景的分析，本文将运城古城的空间结构划分为四个时期。自春秋至宋代，运城

一直是聚落，区域行政中心设于他处，其经济以盐湖的食盐生产为基础。元代（1233 年）盐务管理机构“运司”最初设于潞村，标志着运城城市规划的第一步。以盐务管理机构为中心、外筑城垣的营建始于元代（1356 年）。自明代（1473 年）至清末，中央政府盐务体制的确立巩固了运城古城的地位。据此，本文采用如下分期：

- 1) 第一期：聚落时期（—1232 年）。
- 2) 第二期：运司驻地时期（1233—1355 年）。
- 3) 第三期：盐务专城时期（1356—1473 年）。
- 4) 第四期：巩固时期（1474—1911 年）。

1. 第一期：聚落时期（—1232 年）

春秋战国时期，运城见于记载的名称有“苦城”“盐邑”“盐氏”。秦代运城属河东郡，政府允许民众自由采销食盐，众多商人由此从事盐业贸易，其中盐商猗顿被认为很可能是后世晋商的先驱。

自汉代（公元前 202 年起），盐务官员开始驻于运城，时称“司盐城”。其后汉武帝在盐湖设“盐铁专卖署”，将盐、铁的销售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北魏时期（494 年），安邑县成为确立的区域行政中心，运城仍隶属其下。政府在征收盐税的同时也兴修水利：505 年始凿永丰渠；隋代（605—618 年），为治理洪水对盐湖的损害并改善周边农田灌溉，永丰渠在姚暹主持下得到整修，为纪念其功绩，该渠遂更名为“姚暹渠”。

唐代（618—907 年），政府将河东盐的运销委于商人，并在盐湖与硝池分设盐务官员加以管理。生产技术的革新使传统的自然采集转向人工制盐，产量随之提高。762 年，新制的推行使盐池税收占到全国盐税收入的四分之一、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八分之一。盐池神庙于 777 年奉敕始建，827 年迁至今址。847 年至 860 年间，为防卫需要，人们环盐湖修筑了以竹木荆棘构成的“壕篱”。

然而，由于距安邑过近且产盐量下降，618 年在硝池附近设立解县。随着硝池的开发与产量提升，948 年在解县设解州，成为区域行政中心。直至清末，这一行政层级关系基本未变：运城隶属安邑，安邑隶属解州。

自宋代（960 年起）推行民制官销之法。河东盐每年的收入约占全国盐税收入的一半，成为北宋政府的重要财源。1030 年，姚暹渠重新整治，以改善食盐运输。环绕盐湖的篱障被替换为土筑护墙，以阻止牲畜进入并兼作防洪之用，东、西两门分别朝向安邑与解州。此一时期，运城仍为聚落，称“潞村”。1203 年，因安邑盐产衰减，盐务管理的行政中心迁往解州。

2. 第二期：运司驻地时期（1233—1355 年）

金元时期，由于放弃了先进的人工制盐技术、复归自然采盐之法，盐湖的产量下降。产量的下滑加之地方行政与盐务管理机构之间的矛盾，促使盐务管理机构由硝池附近的解州迁往紧邻盐湖的潞村。

1233 年，主管盐务的官员姚行简着手在潞村营建盐务衙署。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盐务管理机构与地方行政中心的分离，标志着盐务管理从区域治理中独立出来。这一发展被视为后来运城古城的起源。

盐务衙署，即“运司”，成为盐政治理的核心机构。约在此时，政府招募了约一千名工匠，并开辟商业空间以便贸易。此外，还在运司以北修建了城隍庙。运司设立之后，该地区商业勃兴，人口日增。

1292 年，都转运盐使司亦迁至潞村，但城市建设尚未展开。1299 年，主管盐务的官员奥屯茂在运司东南创办公立学校“运学”，旨在提升从事盐业贸易的商人与工匠的教育水平、改善商业环境、促进本地贸易的繁荣。围绕这一教育与行政核心，最初的四条主要街道开始成形。

1314 年至 1320 年间，为感念皇帝豁免赋税之恩，运城被赐名“圣惠镇”。钟楼等公共设施相继兴建，但此时尚无城墙。

至 1341—1368 年，运城已有显著发展，记载户数达四千。城中设有仓廩、望楼、钟楼、驿站、市场与店铺

等公共设施。繁盛的商业活动吸引各地商人云集，贸易兴旺，店肆市集连绵成片。然而，文献亦记载该城缺乏依政府规制而行的城市规划；同时，由于缺少山、河、城墙等防御构筑，聚落在安全上颇为脆弱。

3. 第三期：盐务专城时期（1356—1473 年）

随着盐务机构的迁入，运城发展为盐务管理的专门城市，依托税收征管与商业繁荣而兴盛。1356 年，主管盐务的官员那海德俊着手规划古城，同年八月动工，以盐务管理机构运司为中心、外筑城垣。古城占地 1.8 平方公里，最初称“凤凰城”，其后因运司之设而更名为“运城”。

为便于居民、官员与商人出入，城北、城西与城东各设城门；为便利食盐运输，城南另开两门。南门附近设有中场使署、东场使署与西场使署三处盐务衙门。城门之外，为防洪水损害盐湖而疏浚的姚暹渠，同时兼作城市防御设施的一部分。此外，有记载称关帝庙始建于元代。

明代新的赋税政策（开中法）要求商人将粮食等物资运至大同等北方边防要地，以换取盐引，凭引至运城等南方产盐地支盐，并在政府指定区域销售。在这一制度下，晋商凭借地理优势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至 1458 年，运城原有的五座城门减为四座，并分别更名为：东门（防孝门）、西门（留晖门）、南门（聚宝门）、北门（迎渠门）。1459 年，宗教建筑真武庙得以重修。与盐相关的商业活动通过南门诸署与位于中心的运司加以管理，商人子弟的教育活动则在城东南的运学进行。促成商业活动发展的最初主干街道包括东大街、西大街、北大街与南大街，它们成为古城内商业活动扩展的基础。

4. 第四期：巩固时期（1474—1911 年）

1474 年，明政府修筑名为“禁墙”的防护城垣，以加强对盐湖的保护。至 1485 年，禁墙增设三门：东禁门、中禁门与西禁门；清代又增设南禁门。诸门的位置经过统筹考虑：东禁门距安邑约 2.8 公里，中禁门距解州约 5.6 公里，西禁门距运城约 1.1 公里。

清代河东盐业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因素：其一，技术革新与生产规模扩大，制盐方法的改进提高了产量与效率；其二，中央与地方政府对食盐销售管理的强化，当局以更严格的规制统筹盐的贸易与分销；其三，盐业生产与商贸的政策改革，1688 年的一项政策将食盐的生产、运输与销售交由商人经营，并将商人分为坐商与运商两类。这一改革开启了盐业的黄金时代。

在 1840 年至 1890 年的鼎盛年份，年均产盐量达 10.9 万吨。明清两代政府亦重视禁墙的维护，以保障产盐中心的稳定与安全。1792 年，区域行政中心迁至运城。尽管运城的正式行政等级未变，但该城实际上已成为区域事实上的行政枢纽。这一转变进一步巩固了运城作为盐业治理与商贸中枢的地位。

（1）盐务管理与城市营建

自 1473 年起，明中央政府派遣巡察官员监督盐业赋税政策的执行。1474 年，盐务监察机构“察院”在运司以东建成。察院成为运城最重要的盐务管理机构，位居全城核心。

为更有效地管理食盐的生产、贸易与运输，其后陆续设立了多种衙署，包括：运同署、经历署、知事署、总司署，东、中、西三分司，东、中、西三场使署，税课局、驿传、盐管所与执行衙署等。

为确保安全，自 1511 年起城防不断改善，包括加高城墙并以砖石加固；同时设立守备署、把总署与巡检署等军事机构。1579 年，在运学以东建鼓楼，用以报时并作为公共地标。

赋税政策使晋商获益甚丰，商业活动随之扩展。运城城内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被辟为商业街，最初每十日在东、西、北三条大街轮流举办集市。至 1693 年，南大街亦成为繁忙的商贸场所。北大街成为最繁华的地段，城内店铺逾一千家，其中五百余家专营盐业。清代允许商人自由雇工制盐的政策进一步吸引人口迁入运城。在生产旺季，各地商人云集城中，人口一度达到五万。

运城由此成为晋南地区的经济与物流枢纽。商人自南门入城，先在城南与城中办理行政手续，再经北门、西门与东门分销食盐，进而形成三条食盐运输路线。这些路线通过水陆两途将运城与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相连。日益发展的运输网络使主要干道成为店铺林立、摊肆相接的繁华商业街。

（2）宗教与文化建设

商业繁荣与人口增长也带来大量宗教建筑的兴建，尤以北大街、西大街与东大街沿线为多。主要建筑包括：

- 1) 道教建筑：玉皇阁、火神庙（1551 年）与马王庙。
- 2) 儒家建筑：仰德阁、文昌阁（1539 年）与魁星阁。
- 3) 祠堂：表忠祠（1540 年）与忠爱祠（1474 年）。

城隍庙（1528 年）与关帝庙（1621 年）的重修体现了晋商的影响，他们时常捐资兴建宗教建筑。由于关羽为解州人，成为晋商的守护神，对其的崇祀由运城扩展至全国乃至海外。晋商出行经商之前，会到运城东北的关帝庙祈祷；主管盐务的官员每年亦前往致祭。每年中秋时节，人们在盐池神庙与关帝庙举行仪式，庆贺食盐生产的完成，这些活动往往与热闹的集市同期举行。

（3）教育与社会福利设施

除面向盐商的运学之外，还设有正学书院（1534 年）与宏运书院（1623 年）等学校；城内五个主要片区亦设社学，以服务当地居民。

这一时期兴建的慈善设施包括：永济院（孤儿院，1544 年）、粥厂（应急施粥所，1864 年）、养病院（盐工医疗设施，1889 年）、同善局（丧葬互助，1864 年）、育婴堂（弃婴收养所，1844 年）。

这些机构虽由政府发起，其运营却主要依赖晋商的捐资，足见晋商在运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明清两代，运城作为食盐生产、商贸与文化的中心而繁盛一时。城市的转变由政府政策、晋商的经营精神，以及在社会基础设施、宗教机构与教育上的大量投入共同推动。这一发展使运城确立了晋南经济枢纽与文化重镇的地位。

（三）现状

清朝衰亡、晋商没落之后，中国至 1949 年间历经数十年战乱，全国各地的文化遗产遭到广泛破坏。在运城，城墙、钟楼与鼓楼均毁于战火，食盐生产在这一动荡时期一度中断。

1958 年，盐化局成立，食盐生产逐步恢复。然而 1986 年产盐停止，重心转向附加值更高的芒硝生产。盐池周边的化工产业一直活跃至 2020 年，此后该地区所有工业活动全部停止。此后，运城着手恢复盐湖的自然环境，并将该区域建设为旅游目的地。

运城城墙于 1974 年因道路建设而被彻底拆除，老城的边界由此消失。历史上的运城区域被并入今日的盐湖区。

主要历史建筑已被改作他用：

- 1) 原运司改为医院。
- 2) 原察院现为盐湖区政府所在地。
- 3) 其他与晋商活动相关的盐务衙署因功能丧失而被拆除。

4) 明清时期的宗教建筑除关帝庙外多已消失，原因在于宗教活动的变迁；部分场址被改建为医院、百货商场等公共设施。

5) 与晋商相关的教育与福利机构亦发生显著变化。其中部分已不复存在，运学被改建为现代学校，永济院旧址则建成一所职业学院。

为保护并弘扬运城老城的历史遗产，有关方面已开展多项工作。主要举措包括：

- 1) 将运司与运学遗存、关帝庙、鼓楼、两处商人宅院以及原中山中学等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 2) 将关帝庙改建为博物馆。
 - 3) 对南大街进行旅游导向的整治，其余各主街尚未开发；同时其他道路的建设也使主干道路发生了改变。
- 尽管有上述努力，运城仍缺乏面向文化遗产整体的综合性保护规划。

四、结论

运城是一座历史上以食盐生产与管理为中心的城市，其核心区域集中了主管盐务的行政机构以及供盐商子弟就学的运学。四条主干街道由这一核心向外延伸，将其与城北的城隍庙、城南的盐务衙署相连，构成了城市的骨架。

随着明代赋税政策的推行，商人获准运销食盐，晋商在运城应运而生。这促成了城市的扩张，道路、宗教建筑、教育设施与福利机构的兴建多由晋商出资襄助。中心大街逐渐演变为商铺林立的商业街。然而，政府对商人始终保持严格管理，将食盐的生产与运销相分离。因此，运城的城市空间结构主要由行政框架而非商人力所塑造，而居民的福祉则受益于公共设施的发展。

晋商衰落之后，城墙被拆除，盐务衙署转为新的功能。部分由商人资助设立的教育设施成为公立学校，多数宗教建筑消失，仅关帝庙留存至今。政府对城市发展的持续强力主导，正说明了晋商对运城城市结构长期影响有限的原因。

晋商在运城的存在是一种阶段性现象，由以食盐生产为中心的政策所塑造。运城作为一座建立在盐业之上的城市，随经济格局的变化而不断调适，其特征演变与产业变迁相互呼应。今后，如何将这一转变作为运城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加以呈现，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在晋商兴起之前，运城的发展由政府管理下的食盐生产所驱动。赋税政策实行后，运城成为食盐贸易的枢纽，吸引了大量晋商。然而，由于政府将食盐视为关键财源，始终不断强化对盐湖与商人活动的管理，晋商在运城的影响力因此十分有限，其衰落也几乎未在城中留下痕迹。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晋商凭借盐业积累的财富在平遥设立金融机构，创办了当时堪称中国经济命脉的汇兑业务。在晋商兴起之前，平遥不过是一座农业城镇。商人们将其中心结构改造为商业枢纽，兴建了众多金融机构、店铺与商人宅院，留下了深远而持久的印记。即便在晋商衰落之后，这些要素依然得以留存，构成了今日平遥身份认同的核心。

因此，运城与平遥虽同受晋商影响，但因其晋商兴起之前的产业基础不同，在晋商盛衰之后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城市演化路径。

为保全运城以盐务管理为根基的空间特征，关键在于修复并维护原有的盐务衙署，并开展与晋商商贸活动相关联的体验性项目，如制盐、运盐、盐货交易、盐引兑换以及关帝庙祭祀等。通过让本地居民与来访者参与这些体验，运城可以彰显其作为一座由食盐生产与行政治理所塑造的城市的独特身份。

参考文献

- [1] 柴继光. 运城盐池研究.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 [2] 柴继光, 李希堂, 李竹林. 晋盐文化述要.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3] Hersperger A M, Oliveira E, Pagliarin S, et al. Urban land-use change: The role of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8, 51: 32-42.

- [4] Huang L, Liu S, Kang Z. The protectio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s in historic cities: A multi-actor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al space construction in Fuzhou, China. *Sustainability*, 2023, 16(1): 385.
- [5] 贾红. 国际交流视角下的山西省魅力考察. *外语研究机构纪要*, 2007, 20(35).
- [6] Lovra É, Sarihan E. The form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urban heritage through urban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Pittsburgh. *Land*, 2024, 13(11): 1816.
- [7] 张欣, 赵小平. 盐业资源与地域发展: 以河东盐的历史演进为中心. *思想战线*, 2020(03): 117-126.
- [8] 张驭寰. *中国城池史*.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